

秦汉时期的中印交通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

朱宏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研究所, 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 对秦汉时期中国与印度的交流进行考证,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研究了当时中印的交通状况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

关键词 秦汉时期;印度半岛;交通;农业科技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3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6)14-3558-02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中央集权政治的确立,中原政权同域外各地区、各民族进行了内涵丰富的交流,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鼎盛局面。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古文明同印度半岛各古国文明也进行了接触与交流,并奠定了中印文化交流逐渐繁荣的基础。笔者就这一过程中的陆海交通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进行研究,以从侧面展示中印交通及文化交流之渊源。

1 印度半岛发达的古农业文明

南亚次大陆,喜马拉雅山脉横亘于北部;中部温德亚的山脉贯穿东西;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环绕于其南部。次大陆由三大部分组成,北部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中部的德干高原和南部的沿海平原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活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创造了印度河流域古文明,使之成为世界人类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研究表明,在次大陆的列国时代和帝国时期(BC6~AD1世纪),印度的奴隶制已进入了鼎盛,其农业发展水平相当高;铁器已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恒河上游的密拉特附近发现的属于后期吠陀时代的冶铁遗迹(铁矿石和熔渣)即是明证;耕地使用重型,并出现了牛耕;农田做有畦沟,并已利用粪肥;农作物种类繁多,主要有小麦、大麦、燕麦、水稻、豆类、芝麻、棉花等;饲养的家畜种类有骆驼、牛、羊、猪、狗等;与灌溉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知识地较早产生和发展……等等,这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古印度农业科技文化的发展状况。

另外,从古印度手工业分工之精细和恒河流域城市群落之出现与繁荣,也可以从另一侧面昭示其农业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平。据佛经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列国时代,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兴起了一个城市群落,号称八大城市,即摩揭陀的王舍城、拔祇的吠舍厘城、居萨罗的舍卫城和阿踰陀城、迦尸的波罗痾斯城、鸯伽的瞻波城、拔沙的憍赏弥城和犍陀罗的且叉始罗城等。这些城市,在当时都是“人民炽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其兴起与繁荣,都是以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依托的。

2 秦汉时期中国同南亚次大陆的陆海交往

中国与印度之间相互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远溯至原始社会末期。进入秦汉之后,随着中原政权疆域的不断开拓,对周边关注的视野中,也开始有了关于印度的最早文献记载。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

南身毒,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这一史料显示,中印双方的民间交往与交流可能早已穿越崇山峻岭而在经常地进行着。进入秦汉以后,随着双方帝国的强盛和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双方交流交往亦更为频繁,并因此而渐见于史册。如《史记》称印度为“身毒”,而《汉书》则称之为“天竺”,其中所述双方的具体往来亦更为详尽;而中国以“支那”声名远播也似乎始于印度。

据研究,当时中印双方往来的途径主要有陆路和海路两种,其中陆路交通占据了主导地位。陆路交通有两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支,是取道中亚细亚,途经丝绸之路支线的路线。这一路线开发早,在秦汉时期伴随政权势力的扩张和经济文化交流而渐渐繁荣。中印双方同西域各国的联系都较为紧密,因此,在古代中国的商人和旅行家,往往取道西域而前往印度,印度人来华也大抵如此。这样,印度在当时的史籍中,就被囊括在了广义西域的范畴之内。西汉的张骞,最初也是从西域诸国听说了印度这个国家,这是史载中原政府知道印度的开始。

陆路还有一条,即所谓的中印缅道。《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天子欣然,以(张)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驛,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闪方闭氏、笮,南方闭儻、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盗寇,辄杀汉使,终莫能通。”虽然从这一记载来看,汉武帝凿通这一道路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仍不能否定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即两国边境居民在此之前沿着这一方向贸易往来很早就存在。“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的记载可以佐证这一点。自秦汉王朝将势力扩展到滇西边境后,官道直达古滇越乘象之国(今腾冲境),经济文化在西南支道上的交流自然要较以前顺畅。汉朝在滇西所置永昌郡,不但是王朝经营西南部民的前哨和桥头堡,而且亦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枢纽。到了东汉时代,由于滇西的哀牢夷归附于中央和随之在这里的设郡置县、移民开发,使得中印缅交通更有发展。据史载,当时在永昌郡境内居住的居民成分相当复杂,有穿胸、僰(今缅甸得楞族)、越濮(緬族)、鸠獠(高棉族)、僰越(濮族)、裸濮(卡钦族)、身毒之民,阿萨密的印度人也居住在永昌郡内,这种民族大聚居势必是交往频繁密切的结果。《后汉书》和《魏略》中还有车离国都沙奇城的记载,说其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该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再如盘越(古称高达——盘起,又名汉越王),也是位于孟加拉南部地区的一个国家,这些都和中国西南后或西北地区的民族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作者简介 朱宏斌(1971-),男,陕西凤翔人,副教授,从事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 2006-04-17

海路的开凿始之于汉。《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谫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皆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航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据分析，其中所记述的黄支国，位于今印度东南的马德拉斯附近；已程不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如果这一分析成立，则中印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已相当频繁。从其他的秦汉史籍记述来看，黄支国同中原政权的交往似乎更为悠久。实际上，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取经归来，乘中国商船取海道这一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中印海路凿通历史之久远。

3 中印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

3.1 秦汉农业科技文化在印度半岛的传播 在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交往过程中，除了内容广博的文化交流以外，还存在着农业技术的深层次交流。

中印双方的动植物、种子、生产技术等交流，也可能由僧人或商人为载体进行的，相关的资料也相当丰富，不仅有文献古籍可备考稽，而且现代考古发掘也可提供确凿的证据。如梵语中称桃为“秦地持来”，称梨为“秦地王子”，对钢、红铅、樟脑等的称谓中亦冠以“秦地”字样，反映出这些物品的渊源；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印民族之间农业文化联系似乎更为久远。如发源于中国南方地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主要循西路南下，广泛流布于东南亚各地，并远涉南亚诸国；再如铜鼓文化，这种“文化传播的神秘信号”似乎也昭示了秦汉时期中印稻米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结。

另外，有的学者还认为，从民族语言的角度亦可分析出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在稻米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如 Mahdihassan 提出印度水稻来自宁波方言 *ou-li-zz*，即 *Orgza* 一词的来源；丁颖先生则根据印度稻作文献记载的时间序列断言南亚次大陆的稻作一定源自中国；印度的稻起源在我国之后，据察脱杰 (Chattejee, 1951) 约于公元前 1 000 年的阿阁婆吠陀赞美诗中始见稻 (Vrihi)；北印度巴佛哈那 (Hahud hanaka) 的游得希亚民族确有稻是在距今 2000 年前；其他梵文古籍提到稻的，概在公元前 2~公元前 1 世纪间。实际上，诸多学者则更把印度视之为中国稻作文化西传的中转站。而中国原始稻作农业西传的途径，很可能是从云南西南部、西南部到西藏东南部的广大高山峡谷地区传入印度与缅甸的。当然，稻米播传之说还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验证，但秦汉时期中印双方之间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此外，考古资料显示，西藏高原的细石器传统还可能对南亚次大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印度境内广泛分布的细石器可分为几何形细石器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几何形细石器以梯形、三角形石刃为特征，缺少细石核；非几何形细石器以细石叶为特征，常包含个别的半月形石刃，并有锥形或柱形的细石核。几何形细石器遍布南亚次大陆，非几何形细石器则仅限于印度东北部，两者系统不同。恒河流域的乔塔纳

格普尔高原和西孟加拉一带的细石器，大部分属非几何形细石器范畴，其大致受到西藏高原广泛分布的细石器的影响。至于半月形石刃的产生，可能又和受几何形细石器影响相关。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细石器（非几何形）属于不同来源的两个传统，西藏和印度的发现，说明两者大致以喜马拉雅山为界，而西藏细石器甚至还进入印度东北部，到达恒河中下游。在农业工具领域，还有一历史资料值得注意，即印度贵霜帝国统治时期曾有输入中国铁器的记载。

由于印度在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中重要和特殊的中介角色，中国农业科技的其他方面，诸如丝绸、麻纺等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在印度有所传播，这一方面的史料也是相当丰富，而且也亦为人们所熟知。如见诸与中国史籍的印度市场上的“蜀布”、“蜀锦”、“邛竹杖”；再如印度古籍《政事论》和《摩奴法典》中的中国丝绸之梵语词汇 *cina-patta*，都可视为中国传统农业科技在印度传播的文献证据。

3.2 印度农业文明进入中国的史迹考证 在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交往过程中，尽管其经济文化及民族迁徙的主流，明显呈现出由北而南的主要趋势；而其由南而北的流向，则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结构诸多因素影响，而“往往中断于滇池云岭之间”，但其间经济文化互动性的特征还相当的明显。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明进入印度并对印度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存在印度古文化的逆传及其对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如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就不乏有印度民族来华的记载，典型莫过于关于黄支国的数次贡遗朝献：《汉书·地理志》载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汉武以来，皆来献”；《平帝记》《王莽传》也记述了类似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其与西汉王朝的交往已相当正式，这也蕴涵着次大陆先民同中国的交往的历史可能更早的信息。实际上，早在与中央政权交往之前，印度地区许多民族就已经同中国西南西北的各民族存在经济文化的某种联系，只不过由于常常不及中原故鲜见于史载而已。现代考古发掘显示，在秦汉官道开通之前，沿丝路北传的物品已有不少，主要可考的有齿贝和蚀花琉璃珠，其几经辗转由次大陆分段式进入楚、蜀地域，进而又流入华夏腹地。如 1986 年成都广汉三星堆古蜀王祭祀中所发现了成堆齿贝、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珠，等等。另外，从当时史载的情况来看，在中印民族和文化的交往交流中，似乎印度先民的角色更为主动活跃，尤其是表现在海路交通方面，从这一点亦可推知某些信息。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国末至西汉的铜贮贝器，其上的图饰中就有一组纳立人，其中杂有穿窄衣裤、高鼻深目多须之形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身毒之民，可谓古印度人物形象在西南丝道上留下的最早写照。

南亚次大陆文化同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接触最早、联系也最为紧密，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文字与资料，其过程与具体内容已无从考稽，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上述地区应不乏印度农业科技文化影响的迹痕，其中发源于印度次大陆的棉花种植及棉纺技术在上述地区的传播即为一典型。从文献记载来看，棉花在印度半岛的栽培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公元前 1 500 年的《吠陀经典圣诗》(Findoo Rig-Veda Hymn) 中，就有“织布机上的线”(thread in the loom) 的诗句，可见这一时期的棉花已经进入大规模生产以至可以用来织

(下转第 3561 页)

(上接第 3559 页)

布。中国有关棉花的最早记述见之于《禹贡》(据考证为公元前 3 世纪人的托古之作)“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说明至迟战国时代,东南岛国上的居民已经开始了种植棉花和纺纱织布。考古资料也佐证了这一点,1978 年福建崇安船棺中发现的棉布残片,据考证大约有 3000 余年的历史。秦汉时期,反映南方种植棉花的古籍文献记载更为集中。除此之外,在新疆境内的东汉墓葬中也出土了棉织品,可能是从印度或犍陀罗进口的,当然,与后来高昌国时期(531-624 年)新疆地区棉花的大规模种植现象相联系,亦不能排除当地种植并织成的可能性。另外,有关研究认为,棉花种植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向中原的逐渐渗透的过程。

从史载看,当时中原人关注印度,似乎仍未脱以奇异视之的眼光,如《汉书》载天竺国“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毳登、诸香、石密、胡椒、姜、黑盐”;天竺国出细靡毳氎、毳登”,车离

国(即犍萨罗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等等。因而流入中原的物品也仍以珍稀之类为主,其中不乏珍木稀草、奇禽异兽、皮毛原料、皮毛制品以及毛纺技术。如黄支国所献犀牛,当属印度种。1975 年西安市郊发掘汉南陵丛葬,其中有犀牛、大熊猫等珍稀动物遗骸,有人鉴定推测,其中的犀牛骨骼似即黄支国所献的活犀牛遗骸。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印度文化传入中原腹地,无论在西北、西南丝路,还是在海道上,都是以分段的形式递传的:在北道,是通过波斯或阿接伯商人传入西域或直接传到长安;在西南丝道上,印度及其西部的文化、物资,则首先传入滇西,然而再由大理、滇、邛都至蜀地,最后才辗转传至中原腹地。

参考文献

- [1]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 [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49-50.
- [4] 齐思和.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 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M]//孙机,杨泓编.文物丛谈.北京:中国文物出版社,1991:285-286.